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11.002

吕普生、刘嘉敏：“民众价值观变迁如何影响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 11 期，第 10-23 页。

LV Pusheng, LIU Jiamin, “The Change of People’s Values o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pulism”, *Pacific Journal*, Vol. 26, No. 11, 2018, pp.10-23.

民众价值观变迁如何影响美国 民粹主义的崛起

吕普生¹ 刘嘉敏¹

(1.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摘要：2016 年 11 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 45 任总统，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民粹主义在美国的胜利。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揭示美国民众价值观变迁与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在关联，是验证或发现美国本轮民粹主义根源的崭新视角。通过考察美国民众价值观中与民粹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政治信任、贫富差距感知以及政治立场定位，论文发现民众的政治信任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其中美国民众对于民主体制的信任程度仍然很高，而对于政党的信任程度则有明显衰减，互联网媒体的崛起更导致了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信任度的下降；尽管美国宏观经济状况不断改善，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仍然持有较高不满。在对美国民众政治立场极化程度进行纵向与横向对比后可以发现，美国社会政治两极化程度并不足以解释民粹主义的崛起。

关键词：民粹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贫富差距；媒介信任

中图分类号：D3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11-0010-14

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以平民诉求为依归、具有反精英主义取向的激进民主意识。^①19 世纪末期，俄国以底层农民为主体的“到民间去”民粹派政治运动与美国“人民党”所推动的平民运动就已然将民粹主义推上了政治的舞台，^②而在其后的 20 世纪中，民粹主义深深影响了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乃

至社会文化，甚至被视为拉美政治的顽疾。可见，民粹主义并非近年来才骤然兴起的社会政治思潮，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的政治现象。

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再度得势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政治动向，全球政治文化正在显著甚至急剧地发生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

收稿日期：2018-05-08；**修订日期：**2018-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债危机的政治学分析”（12CZZ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欧洲福利制度面临的新挑战”（115-27410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吕普生（1982—），男，湖南宜章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珞珈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政治与经济、福利国家理论；刘嘉敏（1994—），男，福建平潭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粹主义。

① 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 页。

② [英] 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 页；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36-51 页。

向的变更^①,其中更以欧美等国所发生的民粹运动最为引人注目。正如上文所说,民粹主义一直存在于政治舞台上,但此前在拉丁美洲等被视为民主不太成熟的政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欧美作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渊薮,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一向被认为发展成熟,因此发生于欧美成熟民主体制下的民粹主义显得尤为令人瞩目,这股民粹主义风潮引发人们重新审视作为“民主典范”的欧美等国的政治生态并再度重视民粹主义这一既模糊又真实、既悠久又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

在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中,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议题。民粹主义何以兴起,它背后最具决定性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远非一致。一些学者指出,民粹主义是民主体制下难以根治的痼疾,是“民主自身的投影”,^②究而言之,民粹主义与民主或至少与西式民主始终是相伴而生的。^③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具有反现代化特质的社会政治现象,因而其本身即是现代化的产物。^④与民主伴生物或现代化产物观点不同的是,在周琪等人看来,政治文化中固有的传统是民粹主义得以强烈影响政治体系的根源。^⑤另有学者主张将不同时代发生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民粹主义区别看待,认为不同环境下的民粹主义运动产生各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条件,不可一概而论。^⑥

具体到近年来风靡欧美的这波民粹主义浪潮,一些研究者也就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在林红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其倡导的文化价值分别导致了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财富集中和分配不均,损害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利益并使其陷入经济焦虑,引发了左翼民粹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在鼓励文化多元和宽容的同时却未能很好地保护传统价值与民族文化,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则引起了右翼思潮的反弹。^⑦另外一些观点则将民粹主义的崛起归因

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危机的影响、政党衰败、文化冲突以及身份认同危机等。^⑧

可以说,目前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中不乏深刻的真知灼见,尽管就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尚难言达成一致,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说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一定的共识。然而,关于民粹主义崛起根源的研究仍然过于依赖学者自身的主观观察而缺乏更为有力深刻的客观论据,有鉴于此,本文即试图在学界已取得大量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众价值观变迁进行考察的方法来分析美国新一轮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重新审视学界已有的论断或发现新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来获得对本轮民粹主义运动的更多维、全面和深刻的认知。

政治价值观直观反映了民众如何评价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是诸多政治、经济、历史甚至文化的因素作用于大规模社会思潮的中间环节,正如很难想象对政权满意度越来越高的民众会支持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革命,重建制的诉求在对政治制度充满信任的环境下同样不会吸引大批民众。此外,价值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适用于较长时段的观察,因此考察某

① 时殷弘:“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太平洋学报》,2017年1月,第25卷第1期,第98-100页。

② 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No.1, 1999, p.3.

③ 林德山:“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辨析”,《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第20-23页。

④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8-96页;关贵海、林文昕:“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根源与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第25-51页;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界》,2006年第6期,第189-193页。

⑤ 周琪、付随鑫:“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传统及其功能”,《当代世界与社会》,2017年第2期,第104-113页。

⑥ [英]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19页;赵可金:“大众的反叛:第三波民粹化浪潮及其社会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21-35页。

⑦ 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36-51页。

⑧ 佟德志、朱炳坤:“当代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原因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90-114页。

一政治共同体内的民众价值观变迁无疑有助于客观认识该政体中的政治现象。

在既有的民粹主义研究文献中,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民主衰退理论等固然为民粹主义现象提供了宏观解释框架,却始终不能摆脱笼统主观之嫌,难以剖析作为肇因的政治经济因素与作为结果的民粹主义之间复杂而具体的内在机制。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集体行动的民粹主义,它的兴起和扩张已经席卷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往往并不是民众的一时冲动,而是民众心理变化和情绪积淀所驱动的结果,这种心理和情绪涵括了理性和非理性成分,可以通过价值观调查加以呈现,因此,从民众价值观变迁视角对于民粹主义集体行动的理解和分析,就有着弥补既有解释的重要研究价值。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以及《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等一系列著作中聚焦于价值观这一视角,对以欧美国家为主的民众的价值观变迁进行了分析,为通过价值观分析政治开拓了经典范式。^① 英格尔哈特对于价值观的研究倾向于将价值观作为因变量,描述、分类并定性不同时期的价值体系,如其对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区隔,并在此基础上推理剖析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产生的根源。与英格尔哈特将价值观作为因变量而展开政治文化分析不同,本文将价值观的变迁作为美国民粹主义这一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中的因变量来进行研究。尽管与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框架不尽相同,但本文持论得以成立,无疑有赖于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即价值观及其所代表的大众政治文化在政治实践中的现实意义仍然重大,而非缺乏解释力的可有可无的“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②。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价值观分析并不排斥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或民主衰退理论中的一种或多种理论,价值观视角旨在以更具实证特征的分析手段和相对可靠的经验证据识

别可能对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发挥重大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民粹主义现象不仅仅与现实政治制度、政策相关,更与民粹主义运动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基础和促使这些价值观念转变为集体行动的媒介环境等要素有着密切联系。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采用的美国民众价值观调查数据来自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格尔哈特等人主持的对各国民众价值观进行长期跟踪的问卷调查项目。该数据库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这一数据库的调查数据时间跨度长,自1981—1984年首次采集数据以来,其团队又先后于1990—1994年、1995—1998年、1999—2004年、2005—2009年、2010—2014年进行了五次调查,前后跨度三十多年,适用于对社会结构以及民众价值观等变化缓慢的长周期要素进行跟踪研究。其次,该系列调查所设计的问卷内容丰富、涵盖领域广阔,其涉及的价值问题不仅包括基本政治价值如自由、平等、民主等,还设置了与种族、移民、信仰等议题相关的问题,为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另外,这一数据库还具有调查国家和地区覆盖面广的优点,在2010—2014年周期中进行的调查已经覆盖了世界上60个国家和地区,这一特征为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避免了不同方法、不同口径下导致的错讹偏差。最后,该系列调查由著名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领衔主持,专业化程度高,样本基数较大,内容设计尤为合理,其所采集的数据质量有所保证而且影响力很大,因此,这一数据库长期以来都是学者们从事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等领域研究的权威数据来源,也充分满足了本文所要进行的学术研究目的。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以英格尔哈特主持的民众价值观调查数据库为重要依

^①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叶娟丽、韩瑞波译:《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261页;[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张秀琴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105页。

^②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娄亚译:《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据展开分析和论述,下文如无特别标注,论据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该数据库。^①

在分析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了民主体制信任、政党信任、媒介信任、经济状况评价以及政治两极化等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为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认为可能造成民粹主义崛起的主要变量。本文既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来观察美国民众价值观的长时段变迁,也通过量化的方式相对客观地呈现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地位的感知状态和满意情况,此外,本文还通过横向比较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差异来获得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的更为准确的认识。本文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可靠数据来验证或发现美国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机制成因。

一、美国民众对民主制度与政党政治的信任反差

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人们所秉持的成熟民主体制一贯具有理性特质的传统认知,因而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一些观点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出现了整体性的危机,其运行机制不再被民众所信任^②。鉴于近年来美国民众在“占领华尔街”等美国社会运动中对美国资本主义、被资本俘获的政治体系的控诉,这一观点的确具有参考价值,问题在于,美国民众对于现存政治体系的指责是对这一体系的整体否定还是对其中部分机制存在不满,或甚至只是反对部分政策、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话语修辞?

为了测量美国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肯定程度,英格尔哈特等人主持的问卷调查设计了“拥有民主政治体制怎样?”这一问题,并设置了“非常好”、“相当好”、“相当差”、“非常差”等四个回答选项供受访者选择。2010—2014 年对美国民众展开的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于民主制度持肯定态度(肯定态度比例为回答“非常好”以及“相当好”受调查对象比例的总和,下同)的比例达到了 79.7%,而持否定态度

(否定态度比例为回答“非常差”以及“相当差”受调查对象比例的总和,下同)的比例仅有 17.1%(见表 1)。不到两成的民众对民主政治持有否定态度,可以说民主制度仍然得到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肯定,在美国民众当中依然根深蒂固,整体否定民主制度的价值倾向并非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

表 1 2010—2014 年期间美国民众对于民主政治体系的评价

	数量	百分比
非常好	843	37.8
相当好	935	41.9
相当差	272	12.2
非常差	110	4.9
未回答	72	3.2
总计	2232	100

然而,从纵向历史变迁来看,美国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价值判断也并非一成不变。1995—1999 年期间进行的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对于民主肯定态度的比例为 85.1%,这一数值在 2000—2004 年期间略有上升,达到了 85.8%,而在 2005—2009 年期间,对于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比例下降到了 81.9%,其后更进一步下滑到 2010—2014 年间的 79.7%(见图 1)。这一变化表明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吸引力的确有所下降,但这一变化仍然没有达到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主流民主价值观的程度。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流失的确是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潜在危机,但这一危机仍然只是潜在的而并非现实的困境,毕竟约八成的民众对民主体制表示了肯定。因此,基于民粹主义的兴起得出美国社会对于民主制度甚至民主价值产生怀疑或否定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而民粹主义的兴起更不能被视为美国社会对于民主这一价值的整体性怀疑或否定。

^① “World Values Survey Database”,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 访问日期:2018 年 3 月 28 日。

^② 袁野、姚亿博:“2016 年美国大选初选为‘美式民主’祛魅”,《当代世界》,2016 年 7 期,第 39—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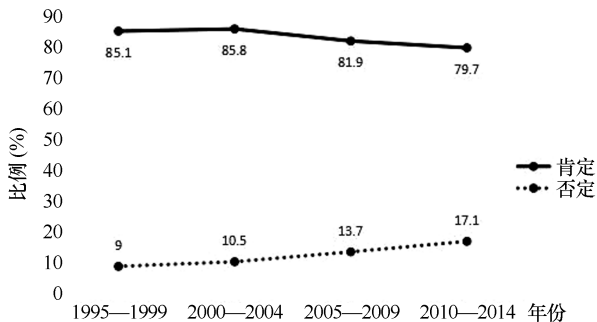


图1 1995—2014年美国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肯定比例以及否定比例变化

另外,从民粹主义所追求的的价值来看,非民主的政治也并非其目标,民粹主义往往比“建制派”的政治力量更加追求民主的政治实践,其口号也常常突出“人民”、“绝大多数”等话语。不管民粹主义可能导致怎样的政治后果,在价值层面其通常仍是主张民主的,因此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对于民主的否定应当是格格不入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民众对于民主制度始终保持较高的信任,但却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全部内容都持有肯定的态度,也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实际运行没有出现问题,更不意味着美国民众缺乏对于民主问题的理性认知。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是美国政治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然而与对民主制度的高度信任不同,美国民众对于政党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调查问卷同样设置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完全信任”以及“完全不信任”四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民众对于政党表示信任(“信任”为回答“非常信任”与“比较信任”之和,下同)的比例最高时仅为23%(见图3),并且在近些年更进一步下降到12.5%。2010—2014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对政党表示非常信任的美国民众仅为1.2%,而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党的比例则上升到了20.4%(见图2)。

美国民众对于政党的普遍不信任是理解2016年美国大选“反建制”潮流盛行的重要考量因素,政党政治是建制化的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但政党在过去数十年间逐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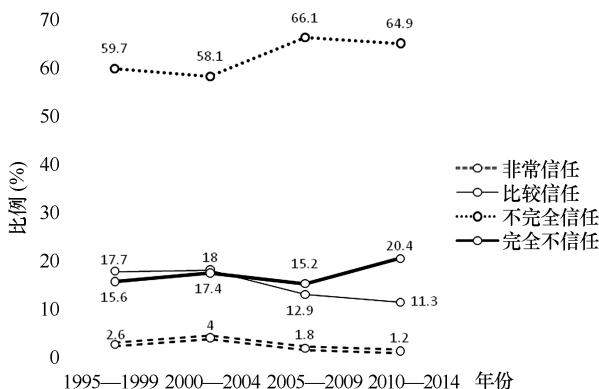


图2 1995—2014年美国民众对于政党信任程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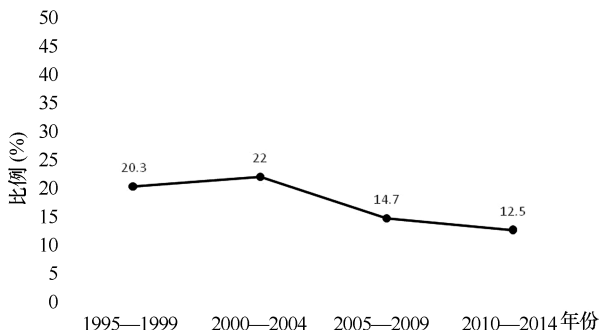


图3 1995—2014年美国民众信任政党比例变化

失去了美国民众的信任,大众已不再视政党竞争为民主的要义,转而视其为精英政治的“遮羞布”或障眼法,并试图寻求真正的民主。正是因为存在对于政党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环境,民粹主义在美国才有了发展空间。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对立面,但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的格格不入却是显而易见的,民粹主义对于“人民民主”及“直接民主”的价值偏好无可避免地与代议民主制度所强调的“理性”价值存在抵牾,换言之,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的矛盾体现的是民主之下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一张力在民主演化历史中始终存在,民粹主义则是对日常化、制度化的间接民主的激烈“反动”,尤其是当间接民主的集大成者——政党在施政举措上没有关切到为数众多的选民的需求时,这一股“反动”力量就容易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特朗普的胜选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美国

民众对于传统模式下两党产生候选人机制以及两党之间竞争性政治表演的不满,美国民众对于政党的不信任甚至厌恶使得商人出身的“政治素人”(从未在政治机构担任过任何职务的人)特朗普在一干获得政党力量支持的参选人中显得尤为与众不同,民众亦寄希望于特朗普得以不受政党掣肘从而真正实现“人民”的利益、“让美国再次伟大”。

二、新媒体革命与民众对传统媒体信任度的下降

不同传播工具环境下的大众传播机制拥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互联网的诞生极大地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使得信息得以在最短时间、最大空间内得到传播,这使得依赖大众参与的民粹主义思潮具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此外,互联网时代对于大众传播而言不仅是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上的量变,更促成了传播介质和传播规律的根本性变革。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媒介传播主流地位的时代,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身份定位清晰,在前互联网大众传播机制中,传播者居于主动的优势地位而信息接受者通常被动接受信息,而互联网媒体赋予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接受者以某种意义上的传播者的角色。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与多数传统媒体之间关系紧张,鉴于传统媒体在以往竞选过程中的重要性,特朗普的当选无疑十分出人意料。在大选之后,学界回过头来探究有利于特朗普当选的因素,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指出,特朗普当选的关键之处在于其善于利用互联网媒体,而互联网在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所揭示的事实则是传统媒体对于传播渠道的垄断已经不复存在。^①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虽非政治组织或国家机构,却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民众依赖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政党则借重于这些媒介来向民众进行政治宣传。虽然大多数传统媒体并不附属于政党组织,甚

至发挥了对政治组织或官员进行监督的功能,但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仍然呈现“中心化”特征,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尤其是以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并不相同。

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去中心化”的趋势与特征,其主要表现就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无中心”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在近几届的总统竞选过程中,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并赋予了总统候选人以直接接触基层选民的渠道。

互联网与民粹主义之间具有独特的亲和性。门槛低、连接广、时效快以及互动性强等传播特点赋予了互联网以大众性的特征,而大众性也正是民粹主义的内在特性,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式的政治运作、吁求大众的广泛参与。正是这种共同的大众基础,使得互联网与民粹主义不谋而合。

皮尤研究中心针对2016年大选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8岁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35%的人将社交媒体视为获取大选信息的最重要来源,其次是新闻网站和手机应用(18%),而在30岁到49岁的受访者中亦分别有19%和15%视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为最重要信息源,^②足见互联网媒体势头之盛。此外,传统媒体影响力的衰落不仅反映在其传统领地遭受到互联网的侵蚀,更表现在新媒体的崛起削弱了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赖。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仍然保持高度信任的话,传统媒体在大选周期中所发起的批评声浪(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影响最大的100家报纸中,56家明显站队表示支持希拉里,而支持特朗

^① 刁大明:“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58页;Francia P.L.,“Free Media and Twitter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20, No.10, 2017, pp.1-16.

^②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 News Event That’s Hard to Miss”, Pew Research Center, Feb.4, 2016,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2/04/the-2016-presidential-campaign-a-news-event-thats-hard-to-miss/>.

普的只有一家^①)很难不对特朗普的竞选产生重大的阻碍。

为了测量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英格尔哈特等人主持的调查问卷分别设置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以及“完全不信任”等四个选项,其中“非常信任”与“比较信任”均被视为“信任”,而“不太信任”与“完全不信任”则被视为“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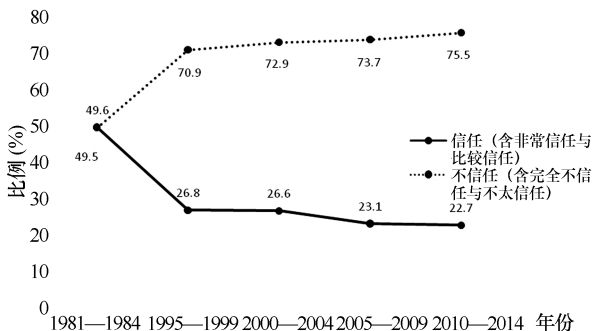


图4 1981—2014年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信任度的变化

可以看到的是,从1995年至2014年,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在逐步地下降,到2010—2014年这一调查周期,仅有22.7%的受访民众表示了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见图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调查团队在1981—1984年间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一度高达49.5%,其中非常信任的比例为11.6%,而表示完全不信任的比例仅为5.9%。^②三十年过去,信任传统媒体的受访者比例下降了超过一半,这对于借助传统媒体开展政治宣传的政治选举而言不啻为一场剧变。

鉴于美国民众对于传统主流媒体信任度的下滑,2016年大选周期中大批传统媒体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起了浩大的批评声浪却未能最终阻挡其胜选的事实则并非不可思议,相反,在大众对于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的情况下,一边倒的批评更有可能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即民众所认同的价值理念不为媒体界所认可,媒介舆论所大加挞伐的对象却能真正代表自身的利益,这一错位导致特朗普支持者确信传统主流媒体完全沦为以华尔街金融界为代表的富人阶级的代言人。要而言之,传统媒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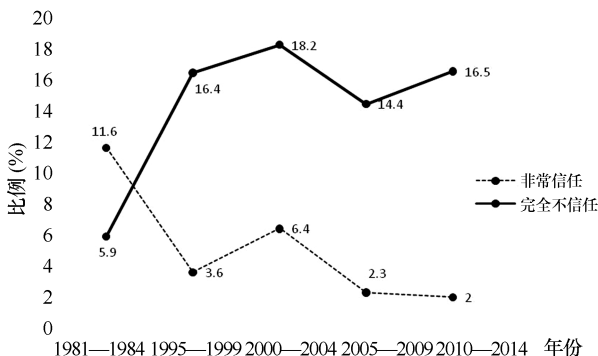


图5 1981—2014年美国民众非常信任与完全不信任媒体的比例变化

批判不但没有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甚至可能对民粹主义的崛起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反建制价值取向是如何通过两类传播介质转化为带有反叛意味的民粹主义集体行动的:一方面,新兴互联网和移动媒介为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和逆反情绪表达提供了低门槛、时效快和可信赖的传播平台,可以迅速而大量地集结民众的偏好和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建制主义组成部分的传统媒体在失去民众信任的情况下所批判的任何对象,都很可能反过来成为民众的拥护对象,因为对于这些反建制的选民来讲,只要是建制派批判的,就应当成为他们所信赖的。

三、主观经济感知和相对剥削感 驱动民粹主义风潮

经济背景通常是理解社会政治现象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的现象而言同样如此。从经验上观察,恶化的经济状况往往是民众产生不满心理的重要根源,这种不满可以表现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也可以表现为对激进政治主张的支持,民粹主义即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① 田智辉、张晓莉、梁丽君:“社交媒体与特朗普的崛起”,《网络空间研究》,2017年第1期,第58—68页。

^② “世界价值观调查”,<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访问日期:2018年1月28日。

有学者指出,长期的全球化进程并未惠及美国的中下层民众,反而导致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这一矛盾在 2008 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尤为突出,在得不到建制派政治力量提出切实有力举措的回应后,民粹主义兴起的环境在美国社会进一步成熟,并最终导致了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发生。^①

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当年以及次年(2009 年)出现了负值,以 2009 年-2.776% 的增长率为最低值,然而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 201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恢复到正值,这表明美国经济相较于 2008 年与 2009 年有所好转。^② 但是,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同样时值 2008 年美国大选周期,美国的民粹主义并未崛起,或影响力极为有限从而难以进入主流视野,而在 2016 年,明显的经济衰退已然过去数年,民粹主义却在这样的环境中抬头,这与部分学者所持的经济危机导致民粹主义流行的观点有所不符。^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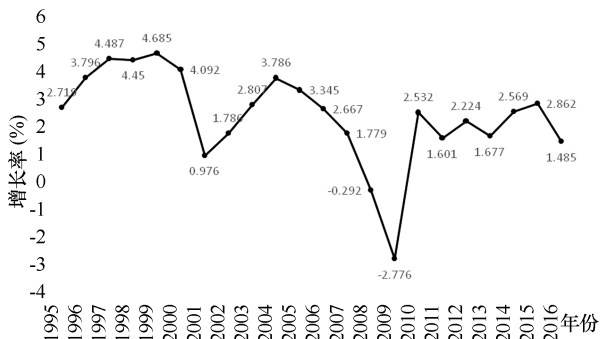


图 6 1995—2016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④

而从美国的失业率数据来看,民粹主义的兴起与经济状况同样存在明显的背离。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比,失业率通常被认为与民众的经济状况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本文也对 1995 年以来的美国失业率进行了考察。图 7 显示,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作为发源地的美国首当其冲地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失业率从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 5.8% 开始上升,并在 2010 年 1 月份上升到了 10% 左右,即从失业数据上

看,美国就业环境在 2008—2010 年间恶化得最为显著,这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动节奏十分相似。而从 2010 年至今,美国失业率不断下降,到举行总统大选的 2016 年,失业率已下降到 5% 以下并持续改善,美国社会却出现了强大的“反建制”力量,助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背离意味着,全球化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失从而使得美国社会拥抱民粹主义的论断难以自洽。^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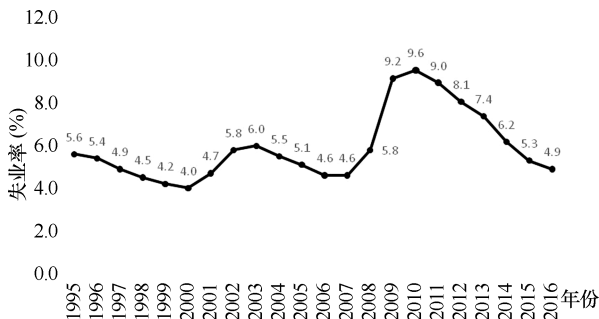


图 7 1995—2016 年美国失业率变化

事实上,早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风潮与经济危机之间的明显背离。有研究在考察拉美民粹主义实践后指出,“民粹主义实践无一发生在经济衰退之时,只有秘鲁 1985—1990 年的实验例外,其它均发生于经济增长之时”,^⑥ 这一结论与近年来美国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跟民粹主义风潮兴起的非同步性十分吻合。因此,将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简单地归因于经济状况的恶化似乎缺乏进一步的论据,单单基于宏观经济数据来分析民粹主义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缺乏直接有力证据的困境。

然而,据此认为美国此轮民粹主义的兴起

① 马峰:“全球化与不平等:欧美国家民粹浪潮成因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29—140 页。

②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6&locations=US&start=1995>,访问日期:2018 年 3 月 5 日。

③ 同①。

④ 同②。

⑤ 佟德志、朱炳坤:“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原因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第 90—114 页。

⑥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 1 期,第 88—96 页。

与经济因素毫无关联则同样失之武断。尽管从各方面上看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在不断改善,但选民如何评价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选民对自身经济处境的满意程度却未必与宏观经济状况一同改善。换言之,当民众对于自身经济处境的评价趋于消极时,他们将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而不管事实上其经济状况是否真正恶化,也就是说,选民的主观经济感知在其选举行为和政治决策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经济感知不仅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也可能受到贫富差距的影响,而当下信息便利的环境更有可能提高和强化人们对于贫富差距的感知度,从而相对剥夺感也随之增强。基尼系数是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用于测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基尼系数数值的确有所提高,近年来更是稳定维持在0.4以上(0.4是国际警戒线,在此以上通常意味着贫富差距较大)。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环境下,底层社会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引发社会阶层的对立,进而可能出现激进的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表达,甚至大大提高社会动荡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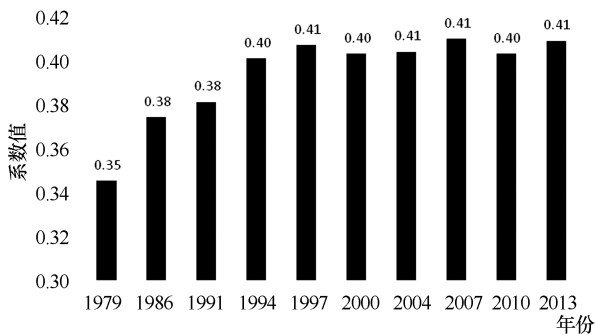


图8 1979—2013年美国基尼系数变化^①

注:世界银行原数据采用百分制,本图调整为常用的一分制。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年份间隔不完全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客观存在的较大贫富差距并不一定与民粹主义的崛起存在必然的联系,贫富差距只有被显著感知到才易于诱发大规模的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而对贫富差距的感知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的严重程度,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舆论环境、大众传播机制以及其他条

件的制约或影响。因此,在贫富差距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时期,如果这种贫富差距未被民众普遍感知到,民粹主义也可能难以得势,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更大的经济环境更容易酝酿出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潮。

与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等为代表性指征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以基尼系数为指征的贫富差距相比,民众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水平无疑是更为直接而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毕竟民众对于现实的感知判断是其政治行为的直接驱动力。

在对美国民众进行的价值观问卷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价选择从1到10的数字,数字越低意味着对经济状况越不满,而数字越高则意味着对于经济状况越满意。为了对美国民众的自我经济状况评价展开历史比较,本文将受访者选择的1~10等十档评价分数分别作为权数,通过对选择不同分数的受访者的比例 $X(X \in [0, 1])$ 进行加权,并全部加总,获得用以表征民众对于经济状况总体满意度的加权和。公式如下:

$$F(X) = X_1 \cdot 1 + X_2 \cdot 2 + X_3 \cdot 3 + \dots + X_{10} \cdot 10$$

由于一部分受访者未回答或数据丢失,为避免误差,本文将未回答受访者比例设为 Y ,取1到10的中值5.5作为未回答受访者比例的权数。因此计算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满意度的最终公式如下:

$$F'(X) = X_1 \cdot 1 + X_2 \cdot 2 + X_3 \cdot 3 + \dots + X_{10} \cdot 10 + Y \cdot 5.5$$

加权值越高则意味着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满意度越高,反之亦然。通过计算,可以得到1995—1999年周期、2000—2004年周期、2005—2009年周期、2010—2014年周期中的加权值分别为6.4665、6.5255、5.8515、6.14(见表2)。

^①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end=2013&locations=XM-XD-XP-XO-US&start=1979&view=chart&year_low_desc=false, 访问日期:2018年3月1日。

表 2 1981—2014 年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度*

年份	1 不满意	2	3	4	5	6	7	8	9	10 满意	未答	加权值
1981—1984	4.6	3	5.4	5.5	11.5	10	15.6	17.8	12	13.9	0.7	6.6875
1995—1999	5.5	2.7	5.4	7.1	13.1	10.9	16.6	16.5	7.7	14	0.5	6.4665
2000—2004 **	4.8	2.6	4.4	7.5	10.4	12.3	19.1	19.7	8.3	10.7	0.1	6.5255
2005—2009 ***	5.9	4.8	5.9	9.2	14.4	13.6	18.4	16.2	6.1	4	1.5	5.8515
2010—2014	5.5	3.8	6.5	9.1	12	11.6	16.2	18.4	10.5	5.7	0.6	6.14

注*:除行、列名称及加权值一列外,表格中数字单位均为%。

注** :由于数据的四舍五入,2000—2004 年各项百分比之和为 99.9%。

注*** :由于数据的四舍五入,2005—2009 年各项百分比之和为 99.9%。

以上经济满意度调查显示,尽管经济危机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都较快地回升,但是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整体评价水平却并未恢复至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这部分可能是由于经济危机的残余影响,但也有可能是由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判断与现实的变化趋势产生了背离偏差。然而无论成因为何,事实则显示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相比,近年来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价有所下降,而这种认为自身经济状况正在恶化的判断恰恰可能是民粹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心理因素。

四、反建制潮流而非极化政治 催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被视为具有非理性特质的政治思潮,民粹主义运动对政治体系或政治生态之所以具有破坏性,正是由于其极端的政治诉求、诉诸大众的情绪化参与手段与既有政治体系的常规化、程序化运行格格不入。在民众立场趋于极端的政治环境中,民粹主义往往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很难想象在绝大多数民众立场温和的条件下,民粹主义能够对政治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通常而言,极化的政治环境的确更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思潮。然而极化的政治环境是否是民粹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民粹主义固然在形式上、诉求上有其极端化

的面相,但这种极端化的特征与政治极化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政治极化通常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立场或价值观在政治立场光谱上向左翼与右翼两极聚集,从而造成社会的严重对立或撕裂。

事实上,尽管民粹主义经常被冠以“左翼”或“右翼”之名,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暧昧不明,更有研究表明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分别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阵营的总统竞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总统竞选者特朗普的政策差异并不如想象中的大,二者所属两大阵营的支持者更存在互相交流的现象。^① 尽管出于赢得竞选的需要,持有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所提出的竞选纲领或政策安排通常会趋于相似(中位选民定理),但这一定理往往在社会稳定、选民具有明显共识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足解释力,而在社会撕裂或政治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却难以适用。这一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所谓两极化与美国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密切。

为了测量美国民众的政治立场,英格尔哈特等人主持的问卷调查设置了“你的政治立场定位?”的问题,并提供了从 1 到 10 的十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从 1 到 10 政治立场逐渐从极左到极右。可以观察到,在历次调查中,5 都是受

^①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0 期,第 68—75 页。

访者选择比例最高的选项,其次为6,两项比例之和接近或超过50%(见图9),这表明美国民众政治立场仍然趋向于中立。在2010—2014年的调查周期中,尽管选择9以及10这两项的受访者有明显的增加,但占据总体的比例仍然很低,可以说美国民众的政治立场分布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并大致呈现正态分布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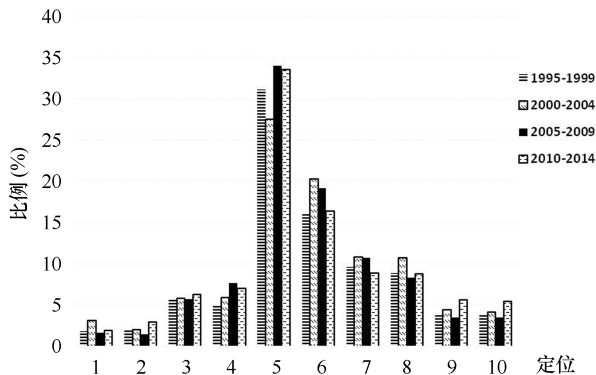


图9 1995—2014年美国民众自我政治立场定位图

为了对美国民众政治立场有一更直观的认识,本文从数据库中选取了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以及瑞典等四个国家的数据来与美国进行横向比较,这些国家均属于广义上的欧美国家,具有类似的民主体制,其中澳大利亚属于大洋洲国家、德国属于西欧国家、西班牙属于南欧国家而瑞典则属于北欧国家,以上国家涵盖了欧美不同的文化地理单元,与之相比较能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如图10所示,与澳、德、西以及瑞典等国相比,美国民众的政治立场极化程度并不明显,其中瑞典民众的政治立场的极化现象更为突出。

在对美国民众政治立场偏好进行了纵向以及横向的比较之后,笔者认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宜被视为代表着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同样也难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因果关系。

在美国民粹主义浪潮中,极端的话语之所以显得突出,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立场温和的民众相对更少地表达自身的态度,而立场趋于极端的民众则在政治活动中显得更为活跃。此外,大众传媒的天然的猎奇倾向放大了极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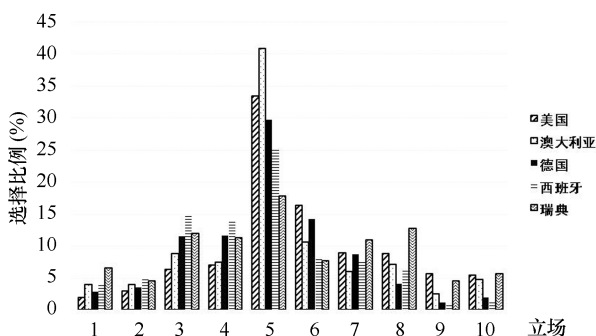


图10 2010—2014年美、澳、德、西、瑞典五国民众政治立场自我定位分布

声音,造成一种两极对立、撕裂严重的现象。看似极端的政治诉求、表达方式并不等同于极端的政治立场,尽管后者是酝酿民粹主义的天然土壤,民粹主义发挥影响却未必借助于政治立场的撕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特定情境下,政治表达方式相较于真实政治立场或许会对最终的政治结果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与其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了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对立,毋宁说其更像是一场反建制派抵抗建制派的运动。因此准确区别(a)基于悬殊的意识形态、政策立场而产生的政治两极化和(b)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矛盾的激化,对我们正确认识美国民粹主义风潮兴起的原因至关重要。与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争斗不同,政治两极化中的不同阵营有着较为清晰明确的意识形态界线,如强调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与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支持保守的社会政策与具有明显“进步主义”特色的社会政策等。而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二者的意识形态对立或政策立场分化,而在于二者对正统政治运行模式尤其是垄断性政治集团的不同态度,这是传统的左右翼视角难以解释的差异。以特朗普的施政纲领为例,其“在经济和社会议题上相对温和,并不反对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体系;他虽然支持减税,但宣称不会削减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支出;他反对堕胎,但同时认为‘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项目让数百万女性受益;他支持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共和党长期坚持的

自由贸易观念;他还攻击华尔街和大银行,说它们剥削了人民却几乎完全不缴税,不愿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① 这些施政纲领很难说可以完全纳入到传统的左翼或右翼立场当中,但特朗普呈现的“政治素人”形象以及对传统媒体、正统政治势力的强烈抨击,却恰恰吻合了大批社会民众对于垄断性政治集团的反叛心理。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政治极化并非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必要条件,但政治极化同样可以催生民粹主义的波澜。政治极化既可以表现为政治观点、力量向左右翼两极的聚集,也可以表现为不平衡的、单向的极化,如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极化则表现为政治社会的极端右翼化。与建制派及反建制派之间的对立矛盾有所不同,政治极化所鼓动激发的民粹主义浪潮通常依恃某种相对完善的成体系的意识形态论述,因而在制定公共政策上具有明确方向,其影响之深远也往往超过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矛盾所激起的民粹主义运动。

正如近年影响美国的民粹主义风潮所展示的,反建制派所持民粹主义立场与极左翼或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建制派所推动的民粹主义缺乏科学完整的内在理论体系和前后一贯的意识形态支撑,也正是因为如此,以反建制派面目出现的政治力量所提出的政策纲领内部逻辑的严密程度远远不如拥有一套完整成熟意识形态论述的左翼或右翼。

这一差异进一步导致两类民粹主义运动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殊为不同。反建制派所主导的民粹主义运动自身的反建制立场决定了其对严密组织的排斥,即具有鲜明的运动性,这一特质通常导致民粹主义风潮难以在长时间内维持其影响力,政治运动特质与自洽的意识形态的缺失使其既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也极容易快速丧失影响力。尽管政治极化环境下的民粹主义风潮同样不免具有鲜明的政治运动特征,但由于秉持着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往往能够在大众激情略有消退后仍然保持相当深远的影响力。19 世纪后期俄国民粹派运动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初的沙皇俄国崛起的

重要背景,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为纳粹党的兴起提供了动能,酿成巨大灾难。

反建制派所鼓动的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缺失是其“先天不足”之处,一旦大众激情消弭,声势浩大的运动极有可能偃旗息鼓,鉴于其价值体系的暧昧模糊和对于组织化团体的反抗,政党等组织化团体也很难实现对民粹主义力量的收编与俘获,因而这种民粹主义运动通常难以实现常规化、日常化的自我维持。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反建制派所驱动的民粹主义往往会在短期内对正统政治生态造成强有力冲击,甚至极大地改变不同政治力量在政治体系内部的构成状况。

综上所述可见,2016 年美国大选中所展现的民粹主义风潮不宜被视为传统意义上政治两极化的表现,由于反建制派的否定主流政治运行体系的姿态,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极端的一面,但这一特质与传统意义上以左右翼为坐标的政治极化仍然相去甚远。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变迁来探究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真正根源及其作用机制,主要考察了与民粹主义关系密切的民主体制信任、政党信任、传统媒体信任、经济环境以及政治两极化等因素。通过历史的分析比较,本文认为,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与美国民众的政党信任、传统媒体信任、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有着密切关联,而民众对于民主体制仍然保持高度的信任。左右翼政治两极化的趋势在美国并不明显,政治立场沿极左到极右也仍然呈现正态分布的形态,大部分民众政治立场在传统政治立场光谱中并不极端,换言之,从传统左右翼的视角看,美国社会尚难言已经出现明显的两极化,当然这不意味着美国社会不

^① 周琪、付随鑫:“深度解析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 年第 3 期,第 9-25 页。

存在极端或非理性的因素,2016年美国大选中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极端面相更宜于被视为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突出矛盾的一种表现。

美国民众对于建制化政党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过去数年间进一步下降,这是具有非建制化面相的特朗普得以在与政党建制派力量不睦的情况下获得选举胜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民众对于传统媒体这种建制化媒介的信任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更是经历了明显的下降,与20世纪80年代初接近半数受访者对传统媒体持信任态度相比,近年来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比例下降到了22.7%,不足前者一半,这一价值观的显著变迁无疑也是美国民粹主义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在经济上,尽管美国在遭遇严重经济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迅速恢复增长、就业环境也在不断好转,但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价仍未恢复至危机爆发前,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与美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存在关联,美国民众基于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消极判断和对贫富差距的感知产生了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积累了大规模的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从而更倾向于寻求民粹主义的手段来表达自身的不满情绪和经济诉求。

对于现行政治体系的肯定与否是决定民粹主义是否能够兴起的根本因素,但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中不同要件的信任却可能出现分化:正如美国民众对于选举式民主制度始终抱有高度信任而对建制化政党评价不高并逐步下滑一样,他们对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功能的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也因为其浓厚的建制化色彩和作为非建制化样态的互联网媒介的兴起而降低,对于政治体系的整体或部分否定促使社会寻求体制外的力量对政治体系进行纠偏或重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民众的不信任态度超越了建制化政党和传统媒体,进一步蔓延至选举式民主体制本身,也许冲击现有政治体系的就不是民粹运动而是政治革命。

本文从价值观变迁的角度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确切肇因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新的探讨。通过本项研究,我们也可以在大规模政治运动研

究领域得到一些理论启示。对于民粹主义这类大规模政治运动,传统上学者们更加注重分析其政治原因或经济、社会根源,由此产生了我们在引言中提及的民主衰退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反全球化理论。这些理论的确关注到了民粹主义爆发的可能影响变量,但对于哪些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量更为关键,这些关键变量究竟是以何种内在机制引发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既有理论仍然缺乏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价值观变迁视角的目标和优势并不在于取代既有理论提出的相关解释变量,而在于从这些纷繁复杂的相关解释变量当中剔除作用微弱的因素,找出最为核心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发现作为肇因的(a)政党信任下降、(b)传统媒体影响力式微及互联网媒介兴起、(c)自我经济状况消极评价与贫富差距感知强烈、(d)反建制情绪高涨等因素与作为结果的民粹主义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清楚有力地揭示影响变量与民粹运动的心理传导机制。这提醒我们在研究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社会情绪和政治心理因素,这类价值观因素将随着经济状况波动、社会结构演化和政府(政党)治理绩效变化而发生变迁,当秉持消极态度和不满情绪的人群急剧增加并出现合适的政治契机时,就很可能借助便利的传播媒介(比如非建制化的互联网)迅速积聚起来,演化为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和反叛立场的汇聚很可能与经济状况的恶化、社会结构的分化表现得并不同步,有些情况下前者会比后者来得更晚,而且未必会导致民粹主义运动,只有在这种社会不满情绪与反叛立场的焦点指向特定的建制派、当权派或垄断集团,并且有着便利的集体行动条件时(19世纪和20世纪是便捷的交通、21世纪是迅即传播的互联网)时,才会真正引发民粹主义政治运动。

由此可见,价值观变迁视角可以更好地理清相关解释变量,有助于为观察民粹主义这一瞩目的政治现象提供一种富有新意且更深层次的理解。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民粹主义是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体系

中的决定性力量抑或只是打破了原先两党制度下所保持的政治平衡,其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既有影响或可能进一步发挥的影响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表面性的?同样令人困惑的是,美国民粹主义是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潮流的一个典型

案例还是与众不同的美国特殊现象?欧美民粹主义能否被视为同一事物?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研究。

编辑 邓文科

The Change of People's Values o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pulism

LV Pusheng¹ LIU Jiamin¹

(1.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November 2016, Donald Trump was elected as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populist vic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verify or discover the roots of the current wave of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ontributes to reveal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people's values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By examining aspects in American people's values such as political trust, perceptions to economic disparity, and positions of political stance,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pulism, the paper finds that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has undergone a marked change. Americans remain highly confident in democratic systems, while their trust in political parties has weaken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rise of Internet media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American public's trust for traditional media. Despi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till highly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own economic condition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s of polarization degree of the American people's political stance reveal that the leve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enough to lead to the rise of populism.

Key words: populism; values;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disparity; media trust